

试说鲁迅对寿镜吾先生的评价

崇 实

前几年，对于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对寿镜吾先生的评价上，流传着这样一种意见：“先生”是“一个典型的迂腐的封建知识分子”，“残害儿童心灵的宿儒”，“封建教育、封建礼教的传播者和维护者”，他“维护封建教育何其卖力”，“用它毒害了后一代”，鲁迅对他的“揭露是深刻的”。这种夸大其词、歪曲了寿先生形象的评价，不符合作品的原意，更不符合鲁迅与寿先生的实际关系，是受了“四人帮”的毒害和影响。在这篇作品中，鲁迅刻划寿先生尽管聊聊数笔，但却鲜明地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分析态度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寿先生总共只有三句话，十二个字：“不知道！”“人都到那里去了！”“读书！”中心就是要学生一味死读书，读死书，什么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等等，或者加上习字、对课之类。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，当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。但是，作为清王朝统治下教封建私塾的寿先生，舍此又能怎样呢？再反过来说，如果寿先生纵容学生们成天去玩，是否就一定算“好”？而且，就在这单调枯燥的私塾生活中，幼年鲁迅确也从中吸取了有用的东西，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写作技能，以至寿先生的态度也从“最初这几天”的“很严厉”，变为“后来”的“却好起来了”。鲁迅在以后的回忆中也几次提到过私塾生活对自己的助益，这可从《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》、《南腔北调集题记》及《人生识字糊涂始》等文章中看到。

诚然，鲁迅也在一些文章中批判过封建私塾制度和师道尊严，但他是把这些与老师个人作了严格区别的。他说：“古之师道，实在也太尊，我对此颇有反感。我以为师如荒谬，不妨叛之，但师如非罪而遭冤，却不可乘机下石，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。”（《鲁迅书信集》上卷 380 页）鲁迅是把老师与敌人、与师道尊严作了严格区别的；对老师的功与过也是有分析的。他对章太炎先生是用这样的原则作分析评价的；对寿镜吾先生的刻划基本上也是用了这样的原则。

写寿先生的两个动作，一是“和藹地在一旁答礼”，二是读书入神时的神态。这固然显得迂腐可笑，但也可见他的善良和好学；虽说是“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”，毕竟还有“空子”留下，给学生们在整天读书之隙，搞点自己所喜爱的活动。

鲁迅在对寿先生的议论中交待：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；也有罚跪的规则，但也不常用。这不同于文言体小说《怀旧》中的秃先生动辄“以戒尺击吾首”。在描述寿先生的外貌、年龄等后，鲁迅直书自己对他的态度及其原因：“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

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，质朴，博学的人。”这段话行文风趣，但决非反语讽刺。在实际生活中，鲁迅对寿先生确是很敬重的：有一次，鲁迅在三味书屋迟到了，先生说了他几句，他就在书桌角上刻了个“早”字，时时勉励警惕自己，从此不再迟到。一八九八年，当鲁迅已不再上学，在家自习诗文时，还请寿先生父子批改；一九〇〇年，鲁迅去寿先生处拜年（见周遐寿：《旧日记里的鲁迅》）；一九〇六年六月，鲁迅从日本回国，在家仅停留四日，也曾探视寿先生，“畅谈国家大事，共同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出感慨。”（见《鲁迅年谱》）《鲁迅日记》载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日、五日赠吊寿师母。一九二三年一、二月间，与寿先生还有书信往来。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，尚与许寿裳在信中谈及“寿老”。鲁迅与寿先生的儿子寿洙邻的过往甚密，这也是与对寿先生的尊重有关的吧！

综上所述，鲁迅对寿先生是敬重的，肯定了他的方正、质朴、博学，以及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等；也善意地批评和嘲讽了先生的迂腐、古板和某种程度上的师道尊严。整个形象给人一种亲切之感。鲁迅笔下的寿先生，虽是三味书屋的主持者，但只是封建教育的不自觉的传播者，而不是自觉的维护者。鲁迅通过自己幼年生活的回忆，把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教育制度，同时针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读经逆流以及厦门大学的尊孔派，进行了现实的战斗，对寿先生是谈不上什么“揭露”和“鞭挞”的。

关于《故乡》中的“希望”

文天行

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中有这样的一段话：“我想到希望，忽然害怕起来了。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，我还暗地里笑他，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，什么时候都不忘却。现在我所谓希望，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？只是他的愿望切近，我的愿望茫远罢了。”贾放、周东泉二同志在《关于〈故乡〉中的“希望”》（载一九七八年第一期《陕西教育》）一文中说：“作者对‘手制的偶像’丝毫没有肯定的意思。”我以为这个分析太绝对和片面了。“手制的偶像”就是“我”的“希望”，或者说理想。丝毫不肯定“手制的偶像”，就是否定“我”的“希望”、理想。为什么丝毫不能肯定呢？贾、周二同志认为：“把《故乡》中的‘我’讲成有‘远大的崇高的理想’，‘对新社会的理想也是衷心崇敬，抱有无限忠诚的信念’，是与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有距离的。”有“希望”与作者当时的思想有距离，无“希望”就没距离了？可这又不符合鲁迅的实际。五四时期，鲁迅是充满着“希望”的。他说：“人类总有一种理想，一种希望。”（《坟·我之节烈观》）“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。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当然，在鲁迅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对“希望”的看法是有差别的。五四时期，他遵奉“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〈自选集〉自序》），向旧制度猛攻，追求好的社会。他歌颂十月革命，说是“新世纪的曙光”（《热风·随感录五十九‘圣武’》）。他还把“希望”通过自己的小说表现出来。《一件小事》赞扬了